

汉魏南北朝诗选注

北京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



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

汉魏南北朝诗选注

北 京 出 版 社

本书的编注者

汉诗 (61 首): 辛志贤

魏诗 (55 首): 韩兆琦

晋诗 (57 首): 聂石樵

宋诗、南北朝民歌和《孔雀东南飞》

(76 首): 邓魁英

齐、梁、陈、隋诗

(51 首): 郭预衡

最后由邓魁英、韩兆琦统一整理

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
汉魏南北朝诗选注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246,000 字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0

书号: 10071·305 定价: 1.25 元

前 言

本诗选共收作品三〇〇篇，其时间跨度是自汉至隋八个朝代。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也许称之为“汉魏晋南北朝隋诗选”更好一点，但这样字数太多，难说难记，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姑且用了现在的这个书名，叫“汉魏南北朝诗选注”。

从刘邦建汉到隋朝灭亡，前后共经历了八百多年。在这段时间里，有稳定统一的局面，也有动荡分裂的局面。这是我国对世界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时代；也是我们国内各兄弟民族大交流、大融汇，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更加发展、更加壮大的时代。在这漫长的八百年里，我国的诗歌发展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它继承发扬了先秦的《诗经》、《楚辞》的光荣传统，广泛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在诗体的形式，抒情的方法，语言的运用，以及音节韵律的斟酌上，也都大胆而富有创造性地进行了种种探索与尝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为唐代诗歌的更大繁荣，准备了条件。

从刘邦建国(前 206)到汉献帝退位(公元 220)，中间四百多年，人称为两汉。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空前强大，文化繁荣并取得伟大成就的时代。这个时代风靡一时的文学是辞赋，但是辞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不高，而真正代表汉代文学高峰的是散文，其次是诗歌。也许是汉代文人都把精力用去创作辞赋和写散文了吧，因此，文人的诗歌创作成就不高，如司马相如的《郊祀歌》、韦孟的《讽谏诗》等，大都仿效《诗经》，平板呆滞。梁鸿的《五噫歌》，张衡的《四愁诗》，是在楚辞的影响下写出来的，感情真挚，文笔流畅，但是这样的作品数量甚少。倒是这个时期的几个政治家的急就短章，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刘彻的《秋风辞》，使人读起来更感到豪气逼人。

代表汉代诗歌成就的是乐府，这是被当时国家的音乐机关所采集保存下来的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期经由乐府机关采来的诗歌数量很多，包括的地域也很广，但今天大都见不到了。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的汉代乐府民歌看，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作品，而且数量也不太多，只有六、七十篇。但是它们广泛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劳动人

民的疾苦，传达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心声。而这些内容，又往往是从那些风靡一时的辞赋和那些庄严肃穆、体国经野的散文中所见不到的，它是《诗经》中十五国风继续。它发展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运用凝炼的口语化的语言叙述故事、刻画人物上，比《诗经》有了更大的进步。从诗歌形式上说，汉代乐府正处在由先秦的四言体和骚体向五言体、七言体发展过渡的阶段。这些无名作家们对四言、五言、杂言都做了反复地钻研与尝试，并基本上使五言体趋于成熟，其杰出的代表就是《孔雀东南飞》。这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一篇作品，它代表青年男女向吃人的家长制旧礼教提出了血泪的控诉，表现了人们对美好婚姻的热烈追求与向往。这首长诗以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它完美的艺术形式，在我国诗歌史上永远放射着奇异的光彩。

在汉代乐府的影响下，在东汉末年的动乱生活中，一批有成就的文人诗歌出现了，其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它们反映了时代的动荡，社会的乱离，通过流利的诗句，抒发着一种人生的苦辛和年命的悲叹。它把叙事、写景、抒情融而为一，达到了极其自然和谐的境地。它的语言浅近，不借雕琢，完全象随口道出，但又无一处不生动，无一处不妥贴。《文心雕龙》说它是“五

言之冠冕”，《诗品》说它“天衣无缝，一字千金”，虽然有些溢美之嫌，但也确实道出了一部分实际。这是汉末文人学习民间歌谣，从而使自己的五言创作达到成熟的标志。这是“建安文学”的先声。

“建安”是汉代的末代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公元196—220）。早在刘协即位前，爆发了反抗汉代腐朽统治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后来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了，但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却形成了一大批拥兵自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这些军阀之间，连年混战，把曾经是繁盛富庶的中原地区造成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一片惨象。直到建安后期，许多军阀在兼并战争中被消灭了，才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而其中又以曹魏的势力最大。曹魏的政治中心是邺城（今河北省临漳西南），后来又建都洛阳。邺城和洛阳在当时不仅是魏国的，而且也是中华全国的文化中心。所谓“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实际上就是以邺城、洛阳为中心的魏国文学；蜀国和吴国都没有留下来多少真正可以称为文学的东西。

“建安文学”以诗歌为代表，建安作家又以曹氏父子为代表。曹操的诗以四言、五言两体成就最大，全是使用的乐府体裁，明显地表现着汉末作家在学习汉代

乐府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诗歌创作的痕迹。曹操的四言诗悲壮慷慨，震烁古今，前少古人，后无来者。曹丕的成就不如其父与其弟，但却有两首七言诗别开生面，在七言体的发展上有重要作用。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曹植，他的作品内容广泛，思想积极，表现了一种奋发向上的豪迈气派。在形式上，他对四言、六言、杂言全都做过摸索与尝试，而成就最高、对文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五言诗。钟嵘的《诗品》曾说他的制作是“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说曹植在诗人当中的地位是“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评价得简直不能再高了。除曹氏父子外，当时的诗人还有王粲、刘桢等，但留下来的作品都不多。

建安诗歌的伟大成就，在于它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和汉末文人五言诗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了建安时代的社会动乱，抒发了作者们关心人民疾苦，愿为削平战乱、重建和平安定生活而奋斗的慷慨之情。这种反映社会动乱、反映民生疾苦的内容，这种凄凉哀怨的思想情绪，这种积极进取、献身事业的壮气英风，合起来就是后人所说的“梗概而多气”，也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所谓“建安风骨”。这种风格气派的形成，是与这个时代的作者们的身世经历、以及他们的世界观紧密联系的。唐代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序》中说：“建安以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道文壮节，抑扬哀怨，悲离之作，尤极于古。”论述得十分切当。建安诗歌是我国诗歌史上五言诗的第一次大丰收，对后世影响极大。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是“正始文学”，其代表作家是嵇康和阮籍。正始是魏帝曹芳的年号（公元240—248），这时曹氏宗室的势力日微，大权日益落入司马氏手中。司马氏为了篡权的目的，一方面收罗亲信，一方面诛杀忠于曹魏的人。名教提得很响，法网日渐其严。这时一些不满现实、不愿依附司马氏的人，为了逃避诛杀，便扯起了希求隐逸、企慕老庄的幌子。他们蔑弃名教，以酒浇愁，口里说着不问世事，但又按捺不住满腹的牢骚，所以嵇康终于被杀，阮籍得以幸免。嵇康的人品可贵，诗作留得不多；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是当时的主要诗人。

阮籍的诗歌在《诗品》中是被钟嵘列为上品的，但是 we 看《咏怀》诗，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建安诗歌的那种关心离乱、反映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忧患个人得失的哀叹；那种奋发上进、改变现实的慷慨雄心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消极隐遁、保命养生的老庄哲学。但是，他毕竟又不能真正地做到“忘世”，于是又恍惚迷离地时而流露出一些愤

世的不平。所以钟嵘一方面说阮籍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一方面又说他“颇多感慨之词”。阮籍诗曾经受过古人的推崇，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又通过他这种以老庄思想为基调的世界观的特殊反映。以今天的观点看来，阮籍诗恐怕就不能与建安诗歌相提并论了。

司马氏于公元二六五年篡魏建国，于二八九年灭吴，国内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统一局面，这就是西晋。西晋统治集团从一开始就极其荒淫腐朽，他们沿袭并发展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度，门阀观念极其严重，朝政经常被一批极为平庸、甚而是极为昏聩的人所把持，而真正有才干的出身于中下层的人则得不到任用。这个时期的作家不少，经常被人称道的有“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此外还有张华、傅玄、郭璞等。但以今天的观点看来，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并不多，大批的是一些出身名门贵族，或者是投靠在贵戚豪族门下，以阿谀奉承讨生活的人。他们的思想庸劣，生活卑俗，专门靠着模拟古人，玩弄词采过日子。例如陆机，这是被钟嵘列为上品，称之为“文章之渊泉”的，但读其作品，却使人感到空洞无物，留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空架子。西晋时期成就较大的作家是

左思，他的诗歌今存十四首，其中有八首《咏史》诗写得最好。他以矫健的笔力，高亢的激情，愤怒地批判了当时那种腐朽的、令人窒息的门阀制度，表现了自己才高志壮、敢于冲击世网的旷迈情怀。和陆机等人的那种单从形式上对建安诗歌的亦步亦趋的模拟相比，左思的作品倒是更加接近建安风骨的。他的诗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为后代诗歌的这样一种抒情方式，做了新的开端。

西晋的统一局面只维持了十几年，随后国内便出现了司马氏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紧接着便是匈奴族的南下，整个北中国陷入了“五胡”的混战之中，西晋王朝也就由此告终了。公元三一七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的东晋政权，是一个被世家旧族所挟持的小王朝，司马氏本身从一开始就没有他的独立性。这个王朝在它所存在的百余年中，抛开它的尚清谈、讲玄理、无力而且也无心恢复中原不说，即使是在它所盘据的建康一带，战乱和政变也是接连不停的。例如王敦、苏峻、王恭、桓温、桓玄，有的打破京师，有的悍然称帝；再加上孙恩、卢循的农民大起义，这个偏安王朝哪里还有一天安定的日子呢！奇怪的是，这个时期的文学竟然也和它的政治一样的腐败透顶，《文心雕龙·时序》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

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作家们完全置国家和人民于不顾，他们写出的玄言诗“平典似道德论”，毫无情致可言。然而这种恶劣的诗风却一直统治了东晋文坛一百年，直到陶渊明出现，才发生新的变化。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或者说是晋宋之交的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整个诗歌史上的杰出诗人之一。他出身低微，性情孤傲，看不惯当时官场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更不愿卷入叛乱频仍的政治旋涡。他的诗表现了他对当时上层社会的极端憎恶与否定，表现了他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傲岸情操，抒发了他退隐田园后虽然生活艰苦，但却能摆脱世俗，远离祸网的怡然自得的情趣。由于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诗反映了一部分当时农村的现实，还产生了一种人人劳动，家家温饱，无剥削无压迫的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是难能可贵的。陶渊明的诗平淡自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他能用极简练、看来象是极平常的语言创造出极其高超的艺术境界。陶渊明是汉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的诗在当时独树一帜，对我国后代的诗歌发展也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宋代的苏轼、辛弃疾，甚至一直到清朝晚年的龚自珍都对他的为人极其景慕，对他的作品欣赏

仿效不已。

与东晋文人诗坛的死气沉沉相比，东晋和宋、齐时代的民歌却放射出异采。这些民歌主要可分两大类，一类叫《吴声歌曲》，一类叫《西曲歌》，都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里。此外尚有《神弦曲》、《长干曲》、《西洲曲》等也应该属于南朝民歌。《神弦曲》见于《清商曲辞》，《长干曲》、《西洲曲》见于《杂曲歌辞》。《西洲曲》的艺术成就极高，是南朝民歌中无与伦比的杰作。

南朝民歌的思想内容比较单一，几乎都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其中有的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和对束缚人的封建礼教的大胆抗争，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商人与歌女之间的唱和之作。单就内容而论，南朝民歌当然是无法与汉代乐府相比的。这大概与南朝民歌的发源地都是当时的重要商业城市有关，同时也与南朝统治阶级当时搜集保存这些民歌的目的和情趣密不可分。南朝民歌在形式上的共同点是好用五言四句，好用比喻，好用隐语、双关语，风格清新活泼。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对当时的文人创作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中有消极的一面，它使文人的创作更加浮靡空虚了；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它使那些杰出的作家们由此吸收艺术营养，去充实发展他们自己的作品。

我们试读一下谢朓、庾信，尤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创作，就可以深切地理解南朝民歌对我国诗歌发展的作用是如何地不可低估了。这些五言四句的体制，为日后五言绝句的形成做出了大致的规范。

与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其艺术形式，就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了。以今天所能见到的北朝民歌看，大部分是北魏时代的作品。北魏建国于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后来逐渐平定、统一了北方，成为与南方宋、齐、梁、陈并立的北方政权。北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北方的风土人情也与江南大不一样，北朝的民间诗歌就特别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北朝民歌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七十来首，见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横吹曲辞》。它基本上是延续了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反映的社会生活较广，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较强，诸如战争徭役、人民疾苦、北地风光、骑射生活，或多或少的都有所反映。而其中最为杰出、永著不朽的作品是《木兰诗》。它描写了一位代父从军的女英雄，表现了劳动人民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气质，和热爱家乡、热爱亲人，为解除亲人危难而不惜贡献个人一切的崇高美德。同时这又是一篇提高女权，为被压迫妇女伸张正义，使她们扬眉吐气的杰作。《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前后交相辉映，雄视千古诗坛。

从公元四二〇年刘裕建宋，到公元五八九年隋朝灭陈，中经宋、齐、梁、陈四代，因为它们全都建都于建业，所以人们通常称之为南朝。南朝四代的政治，除宋初的三十几年比较可观外，其余都是非常腐朽的，而且积衰积弱，每况愈下。统治阶级荒淫奢侈，迷信神佛，而且往往又都提倡文学，卖弄风雅，因此南朝的好几个帝王也都俨然活象一个文学家。不过文学在他们手下也就变得愈来愈淫靡，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的玩物了，其顶点便是梁陈时代的宫体诗。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该加以鉴别提出的诗人是谢灵运、鲍照、谢朓和庾信。

谢灵运是由晋末过渡到宋初的诗人，和陶渊明大致同时，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是完全不同的。谢灵运是大贵族，由于在政治上感到不得意，因而肆意遨游，寄情山水。谢灵运对于诗歌的贡献，是以他个人的创作使诗歌发展完成了由玄言向山水的过渡。《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认真地说来，谢灵运的诗歌在内容上是没有什么可取的，它一般都是先有一些山水景物的描写，而后就是讲佛理，发议论，真正的感情很少；而且往往又多是为时而作，可以见到几个好句子，而通篇仍是生涩板滞，常使人难以卒读。但是尽管如此，谢灵运对山水诗的开创之功仍是不能抹杀的，他比那只靠着“体裁

绮密”、“错采镂金”取胜的颜延年要强得多。

南朝最有才华，诗歌成就最高的作家是鲍照。鲍照出身寒微，一生坎廛不遇，最后死于乱兵之中。他的思想和创作，与左思很相似，但是诗歌成就比左思高多了。他继承了汉魏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猛烈地批判了黑暗的门阀制度，表现了昂扬激越的爱国思想和勇敢豪迈的进取精神，他反映了当时任何其他作家所没有反映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形式上，他除了大量地写作五言诗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七言和杂言，在这方面，《拟行路难十八首》是他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思想深刻，感情奔放，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肖子显说他“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南齐书·文学传论》），恐怕还是有些道理的。鲍照的诗歌讲究形式，但是因为它有内容，所以为任何南朝诗人所不及。鲍照的乐府诗，尤其是《拟行路难十八首》不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形式，都对唐代作家如李白、高适、岑参等发生过重要影响。

谢朓是齐武帝永明年间（公元483—493）最有成就的诗人，与之同时并与之气类相似的作家还有沈约等。谢朓继承了谢灵运的山水诗风，在风格上变得更加清新流丽了，例如他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在诗歌史上是一直

被人称道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对谢朓念念不忘。但是，和谢灵运的毛病一样，谢朓诗的内容多是空洞不足取的，而且也往往是“有句无篇”。谢朓及其同时代作家对诗歌发展的贡献，在于永明新诗体的形成，也就是声律说的确立。

写诗讲究音韵美，这个问题早在曹植就已经开始了，沈德潜说曹植的诗是“五色相宣，八音朗畅”（《古诗源》）；沈约说他“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宋书·谢灵运传论》）。但是问题的自觉提出，并从理论、实践上加以确立运用的乃是在齐梁。《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南史·陆厥传》云：“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说的确立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声八病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也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开始，五言诗除了旧有的建安、陶渊明以来的这种被后世称为“古诗”的形式外，又逐渐出现了一种讲究平仄韵律的新诗体，这就是律诗，或者照唐人的说法叫做“近体诗”。